

217
刊創日一月四年四十三國民

自由論壇

期六第 卷三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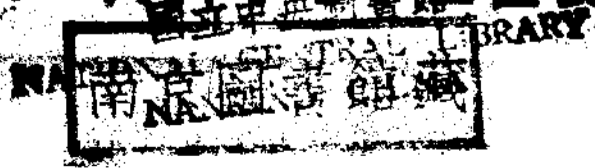
時評專論

一月時事述評.....	沉痛話經濟.....	國庫能吸收遊資嗎？.....	論土地改革.....	中國知識份子的出路.....	是誰耗了我們的金糧？.....	湖北省營企業的最後一關.....	美國關係中的插曲.....	和費地課.....
本社資料室	黎少半	李伯洛	黎樹德	談師雅	彭石	有年	直之	雲波

美國的教育問題..... arther Schlesinger, Jr. 譯作

自由論壇社印行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六月一日出版



和戰的謎

雲 坡

由於美蘇冷戰愈打愈激烈，因而國際空氣愈緊張，好像第三次大戰有一觸即發之勢。忽然莫斯科發表史密特與莫洛托夫的往來函件，說明美蘇同意直接談判，立刻國際緊張的空氣轉為輕鬆，世界和平大有彈指即現的希望。接着，美國政府鑑於英國表示不滿，恐怕影響西歐聯盟，乃聲明美國外交政策不變，絕不與蘇聯單獨談判，和平空氣又為之沖淡。華萊士與史達林公開通信，在以和平相標榜，兩國的拉攏又似乎可能。因此，目前世界形成撲朔迷離的局面，究竟和乎？戰乎？成了一個謎。

因為這個謎的底不是一下子能夠揭開，人們便各就利害感情來推測。厭戰喜和，是一般人的心理，看到兩大壁壘森嚴，冷戰快要打成熱戰，為之深憂太息；又看到兩國可能以會談方式祛除和平的障礙，則又眉軒色舞，心花怒開。另有一種人却想藉世界戰爭解決本身問題，當本身問題沒法解決之時，即渲染大戰將發，企圖把問題轉向，免使國人反對自己的頑固政策；一聽到和平消息，便眉頭一蹙，詛咒國際虛偽，反覆無常。其實，恐懼戰爭與詛咒和平，均不足以影響國際局勢的發展，而國際局勢和乎？戰乎？有其一定發展的路線。就是說，和戰的謎決不是帶有感情的看法所能猜透的。

我們要想拆穿這個謎的底，須得從謎的本質來分析。第二次大戰是資本主義國家相互衝突的最高潮。這高潮隨着戰事結束轉到另一方向，就是資本主義國家和社會主義國家對立的尖銳化。蘇聯經過大戰的考驗，舉世詫為奇蹟，國際地位驟然抬高，其他許多國家以地理經濟種種關係，不能不趨承他的領導而躍進。美國自羅斯福逝世，更無人能夠控御金融寡頭的繃繩，他們看到蘇聯戰後勢力擴張，不僅感到領導世界遭受威脅，即生存上亦覺慄慄危懼，因而表現一面倒的政策——防蘇防共。因而構成東歐西歐兩大集團，因而世界裂為兩個。兩個世界，是不會產生和平的。但是，兩個世界并不是絕對不能暫時相安，必須馬上開火。當然，誰不願意視世界的牛耳，借戰火把兩個世界銜為一個？可是，今天的戰爭不是好玩的，毀滅性太大，攪得不好，舉國為墟。而今天彼此的國力和與國的陣容，又是洞若觀火，戰得戰不得，各人心裏有數。明明戰不得，誰敢輕於開釁？冷戰儘管打得激烈，熱戰是不會打成的。蘇聯不利於戰而利於不戰，誰肯向不利的路徑上走？美國一方面以戰為利，一方面以為不利，除了金融寡頭，誰肯引戰火以自焚？至於英法以次國家，更無發動戰爭的資格。可以說，今天國際的緊張局面，完全由於美國為圖挽救國內經濟危機，積極執行援歐計劃，經濟援助不夠，進而為軍事援助，就是這樣越演越緊張的。正因為美國沒沒顧影，徬徨不安的情緒日增，不惜毀棄對內尊重國人自由，對外干涉他國內政的優良傳統，而發出一連串令人冷齒的動作，越發失掉他的領導地位；蘇聯便越發有了保障，安安穩穩作培養國力的遠計長圖。由此說來，因為世界裂為兩個，便否定了和平。因為無人敢為戎首，又否定了戰爭。那麼，和戰的謎，可得謎底如下：

戰也戰不起，和也和不攜，不和不戰的時期相當長。雖然結果不免一戰，但決不是憧憬戰爭爆發藉而解決本身問題的人們所幻想的那一回事。

美蘇關係中的插曲

直 之

一樁關係全世界安危禍福，嚴重重要得了不起的事情，由於美國政府當局喜劇化的行動，變成了國際上一個可笑的故事和美蘇關係中的一段插曲了。

事情是這樣的。美國七週咨也計美蘇...

談判與解決歧見之門，是始終敞開着的。(一)五月四日美駐蘇大使史密新致莫洛托夫函。(二)蘇聯答覆說：好，我們同意這個建議，並將美國方面的函件公布出來。但是美國忽然翻悔了。杜魯門總統和國務部一再發表聲明，否認美國的照會與蘇聯舉行談判的序曲，亦一再代表美國政策有新的轉變。索性一下子否認得乾乾淨淨也好，可惜又要留點面子，拖泥帶水，從華盛頓的一高級官員口中吐露消息，問蘇聯有何具體的建議；並且暗示不在乎的神氣說：「美國不擬坐於雲端，從事眩人耳目的高談闊論。」(三)聯合社華盛頓十二日電(似乎有意捉狹的史達林，於是公開表示：華萊士給他的公開函件中所提的建議，可作談判的基礎。這個料想不到的答覆，自然是在請杜魯門和馬歇爾從一雲端一裏走到地上來，開始並不空洞的談判。但是，這時候，美國方面又避實就虛，來一個乾脆的拒絕。同時近於抵牾似地說，蘇聯目前還未改變不合作的態度，美國將以充分的時間發見蘇聯改變態度的證據。有某記者問馬歇爾：「兩方談判之問題是否已經死亡？」馬歇爾答稱：「在其可以死亡之前，有若干事仍必需仍然生存。」(華盛頓十九日電)這種含糊的說話雖足以約略顯露美蘇和談的門戶尚未完全關閉，但是從五月四日美國對蘇聯說談到五月十八日史達林發表談話為止的這一段美蘇雙方探討和談的經過，畢竟已成美蘇關係中的一個插曲。這個插曲，固然使人對於美國當局那樣一再陷於進退失據，應付不安的情形，覺得可笑，一面也使人看出美國當局之所以那樣一味閃避真正的和平談判，原來就因為並不打算在一個接近華萊士建議的原則上與蘇聯進行和談。換言之，美國所意味的和談，是要蘇聯放棄自己的立場，來接受那毫不加以修改或牽就的美國原則。美國建議和平談判，而又要固守原來的地位，不願意向蘇聯走進一步，是其閃避和談的真正原因。

另一方面，蘇聯的世界政策方針如為美國所宣傳的擴大共產主義的侵略，則其聲言以華萊士的建議為談判基礎，是已修改了固有的原則，而向美國走進一步了。華萊士不會為蘇聯擬訂一個不利於美國的和談計劃，乃屬不可爭辯的事實，華萊士的和平理想也決不比大西洋憲章陳義更高，寧可說是大西洋憲章思想下的必然產物。但是這種思想已不合於今日美國政府中一部份人的脾胃，而必須深閉固拒。由此可見美國今日所拒絕的不是蘇聯願意奉就的華萊士式的和談，而是一切接近大西洋憲章的和平思想與願望。就此一點而論，美國今日所持的世界政策，是根據一種什麼思想，抱一種什麼目的，也就不問可知了。

雖然如此，這一段美蘇關係的插曲，畢竟是有比沒有的好。因為靠着這個插曲，我們多少可以確切知道，目前美蘇的對立，儘管是無比的尖銳，而雙方的內心却都免不了有些虛軟，不然，美國不會問蘇聯願不願意談判，蘇聯也不會有同意的表示。這種表現，正如華萊士所說：「對於始終認為和平是可能的我們這些人說來，實為一種偉大的希望，而對於硬說兩個不能在同一個世界和平共處的雙方宣傳人員說來，實為一種嚴重的打擊。」現在美蘇的和談雖然一刻不能實現，而美蘇兩國之不願意作戰的心迹却可以使世人週知了。其次，這個插曲雖然是一個插曲，却有澄清瀰漫在美國國內外的「戰爭氣氛」的功用。美國外交，在這一件事情上所表現的儘管是出爾反爾，狼狽周章，令人失笑，但是美國在暗地裏與蘇聯講交情的印象，在一些滿腦子捧美國出來和蘇聯講狠的歐洲政客的腦中，一定不可磨滅，也勢必要產生失望的情緒。這種失望的情緒，滲雜着隨時可以被出賣的實際恐懼，將降低美國在歐洲的威信，影響其今後在歐洲的作為。這種傾向，對於保持歐洲的和平，不失為有力的因素，對於廓清歐洲的火藥氣味，也不能說不具有積極的作用。再則，史達林答應願以華萊士的建議作談判基礎，加上那種毫不鬆勁，硬要逼起美國外交當場出醜的作風，其在無形中給華萊士的競選幫了大忙，減損美國人民對政府當局的信仰，猶其餘事，最要緊的是在借華萊士的主張做媒介，將蘇聯的和平願望，用美國人可以親切了解的觀念，訴之於美國人民和全世界的輿論。這是澄清美國國內「戰爭氣氛」的最佳辦法，當然可把美國當局苦心經營了一兩年的對蘇宣傳效果予以推翻，也叫其他國家盼望第三次大戰到來的人們的熱心腸冷縮一下。

最後，我們仍願重視這個插曲中美國首先對蘇發動和談的意向。一切可以說得壞，唯有這個意向，無論出於何種動機，既經表白，就應當認為多少

含有求和的誠意。倘不肯定這一點，則美國對蘇提出和議，又去否認，無異於和自己開玩笑，於理說不通。現在和談雖然沒有成功，我們仍望美國保持這個良好的意向，並力謀與蘇聯接近的機會。

湖北省營企業的最後一關

有年

筆者曾在湖北論壇第二卷第八期發表「省營企業向那裏走」一文，文裏面說：「人民信賴政府，授政府以整理全權，不許有人牽掣，總算對得起政府吧！政府復員快兩年，建設廳廳長任職四五年，時間不為不久，到今天還拿不出一個明白確定的政策來，讓湖北省營企業長期停滯於彌留狀態，不管有沒有摸魚掏雞的事，像這樣貽誤下去，是不是對得起人民呢？請政府反省一下！」又說：「今天人們一談到湖北建設，動不動就謳歌張文襄，首先就提出紗廠四局來。張文襄時代距今五十年，這五十年間，世界工業的進步真是日新月異，我們今天把五十年前的建設說為奇蹟，如果張文襄是人不是神，這異口同聲的稱頌，好像是給主持省政和建設的人以深刻的諷刺。不過人的感覺不同，是諷刺不是諷刺，可以不求甚解。廢話少講，今後省營企業究竟往那裏走，是向墳墓裏走？是向光明之路走？羅針是操在政府手裏的。」筆者又曾在湖北論壇第二卷第十期發表「正視省營企業的歸宿」一文，文裏面說：「如果科學是可信的，制度是可以決定事業的成敗，拿委員會管理企業，便絕對沒有成功的希望。誠然，古今中外沒有絕對成功的制度，人的關係最為重要。問題就在，在某種制度之下，只要得人，一定可以成功，就是好的制度。在某種制度之下，無論任何人都沒辦法，都沒成功可能，就是壞的制度。從科學的看法，企業是要用商業方式管理的，不能用官廳方式管理的。企業委員會是行政機構，顯然是官廳性質，不合現代企業的要求。：省營企業在這樣的制度之下，前途是光明是墳墓？如果科學可信，那是不難預決的。」又說：「政府既堅決要採用這種制度，應當有他的把握。人事的健全，也許可以補救制度的缺點。：：羅針已由政府交給全體委員手裏，省營企業歸宿何處？湖北人正拿四五千萬隻眼睛正視着哩！」

這兩文發表之後，政府是不起絲毫反應的，他們很沈著的照着既定方針做去。現在萬耀煌主席和譚嶽泉廳長都已卸任，晏勳甫主任委員競選立委已經成功，回頭看看省府兩年以來堅持的唯一的企業政策——企業委員會，到底有些什麼成就？我們只看到：一個一個的廠子或機器不斷在出賣；政府可以隨時隨意發表企業委員，也可隨時隨意向企業委員會提款；兼任委員按月拿交通費，專任委員按月拿與省府委員同等薪俸，年終還可以分紅。除了看到這些之外，並沒有看到任何工作和成績表現。省營企業是不是走進了墳墓？我們不忍進行論定，但沒有得到光明的歸宿，則可以斷言。保全面子不說醜話，憑良心講，萬主席、譚廳長、晏主任委員，對於省營企業的責任是交代不下去的。可是，事實上他們已經走了，遺下省營企業的責任，已經落在現任主席，廳長主任委員的肩上。怎麼辦呢？據聞省府新聘的主任委員朱懷冰先生以改組公司為受聘的條件，果爾，則湖北省營企業的前途或有一線之望。不過，湖北省營企業確已到了最後關頭，這一關外有兩條路，一條生路，一條是死路，究竟走那條路，全由政府抉擇。而生路死路的標誌分明，並不難於抉擇。只是死路上鬼影憧憧，花樣百出，容易給政府和主管人以誘惑，所以今天許多事大家都睜着眼睛向死路上走。整個政治局面如此，區區省營企業，在今天本是龐大的問題，值不得小題大做，因為關係全湖北人公共的家當，而臨着最後一關，不能再盡最後一次的忠告。

筆者最近為省銀行「用存銀及省府任意向省企業機構提款函請省參議會查究，內有這麼幾句傷心話，「政府所恃以無恐者，社會名流入吾彀中耳。只要社會名流與政府利益協調，互相諒解，就是買光吃光，也可安然無事，買光吃光之後，政府還是政府，名流還是名流，決非小民所能否認。」這裏要聲明的，並不是說個假名流都是這樣，却是確有這樣的名流。這些名流不但不引起湖北人民，略政許於不法而使他們掉人心，也就對不起政府。筆者又曾在「省營企業向那裏走」一文被說過，「議會請公替人民把權交出去了，人民不反對；但伴隨着權所應有的責，如果沒有盡到，希望本着監察職權問

一問，向人民報告一報告。一到今天還是存着這個希望，希望不時得到真實而詳盡的報告。

是誰虛耗了我們的食糧？

彭石

日昨（五月二十三日）報載有鍾祥縣田糧處胡家集辦事處巡賦谷乙批運漢，經在橋口下碼頭緝獲，據供係由該處轉斗灣王家管收納倉庫管倉員劉克寬交運，共三十四老石，已在沙洋賣出二十一老石，尚存三十老石。

其實，低到一個收納倉，小到一個幾十石，在這貪污社會裏，似乎本無足輕重；不過，這一次總算人贓俱獲，不僅是事出有因，而且是查有實據。在這以前，別的不說，單從官報上透露出來的消息，便有過好幾筆。

二月一日新湖北日報載華中社訊，天門縣田糧處岳口辦事處主任王昂哉，自三十五年八月由該縣縣長帥雲屏介紹任職以來，首即以斗進秤出，每担中飽至一斗以上。在三十六年度內，又將田糧新收現金，在岳口買貨，私運沙洋出售，再轉購沙洋米運漢繳軍糧；兩年來挪用糧款，漁利在十億以上。嗣鄂中有警，該主任即拚命催繳，折收現金，并已購有沙洋米一批運漢；即聞岳口被侵，乃邀士紳證明，謊報損失糧谷四千六百擔，大米二十萬斤；時值約五十餘億元，現攜妻逃漢作寓公，曾對其處內大小職員各分五百萬元至八九百萬元不等，鎮長汪耀清獨得一億元，花去招待及旅費約三億元。同月四日，華中社又報導該王某因見劣跡昭著，已席捲遠颺，不知去向。

四月四日同報又載天門通訊兩則，一為田糧處岳口辦事處主任倪某，亦邀人證明，謊報損失數百石；一為彭市河辦事處主任黎某，於潛江不靖時，浮報報去庫糧二十六萬一千九百斤，實則並未徵收實物。

這三件事都恰好出在天門，據分析是三個原因，第一是李仁林和張健部一來即去，實際上來不及搬糧食，獨只爲糧食們造成了一個報損的好機會。第二是從縣長帥雲屏袒護王昂哉起，開了一個惡例，各辦事處主任自然也不願意落後。第三是天門縣的士紳好說話，只怕官威，不怕民難。

關於岳口運軍糧來漢兜賣的事，在報上未揭露出以前，便已是人言嘖嘖；但多以事不于己，未加深究。其後經報紙披露，岳口是市兩地均有邀地方人士證明之說，筆者曾走訪兩地士紳，據岳口士紳說，自己搬走時很撒了一些在路上；來不及搬走的，也確實給附近的人掃了倉；不過爲數終屬有限。因爲存量估計最多也不過五百餘擔。我們只可證明其有損失，數量是天曉得。皇市的士紳對這比較更說得確實一點，根本便沒有倉存，早已運走，只有二十餘擔在交廠加工中，作算有損失也止於此數。

現在這些都還沒有下文，要說事屬子虛，何以當初言之鑿鑿，而且迄今并無人加以辯正。鍾祥縣田糧人負盜賣賦谷之被緝獲，令人不禁憶起這一連串往事；只要是一個有血性的人，對此都不能說是毫無憤慨。

民以食爲天，食糧是何等的重要。今日戰火熬煎了人民的生活，使得人民不得不負擔徵實徵購的重累，已經是不不得已的事。本來處於科學昌明的今日，連天災都要視爲人謀之不臧；退一步的想法，姑且連人禍都視爲天災，忍受着命運的擺佈；這代表着我國善良人民之安分守己，聽天由命的心理。可不料萬惡的糧食們正利用這一善良的心理來趁火打劫。

在抗戰期間河南的糧官，描寫人民之踴躍輸將，謂口罄其所有；當時大公報曾寫了一篇遭受停刊處分的社論，題目是看重慶，念中原，曾成爲以後有些社論標題的公式。其中有兩句畫龍點睛的句子，就是說罄其所有，是血淚文章。想不到今天之血淚文章，是只爲了糧食們之貪污享樂，且在法外逍遙復逍遙而作。

在湖北的行政史上，近來已有兩個縣長是以一走了之案，王錫哉之潛逃，原意中事。苦總是苦老百姓，米賣到六百多一石了，民食調配委員會要買一點米來供應，都感到相當的困難；然而糧運們是成幾千幾百石的說報損失，真不知人間何世？什麼事是真的，肚子餓了是真的，是誰虛耗了我們的食糧，便應該要和他算賬！

中國知識份子的出路

談師籍

從經濟的角度看，中國知識份子應該由純粹消費的路走上促進生產的路。

由普通人變成爲知識份子，必須經過很長時期的學習過程。這個長期學習的過程，也必定是脫離生產勞動的過程。他們在獲得較廣較深的知識以後，便憑藉優越的知識，在社會上取得特殊的身份，維持一種收益的方式，不需要體力勞動，不參加生產工作。當學其所學的時候，他們靠社會養活。當用其所學的時候，他們仍然要靠社會養活。他們的生活完全與生產勞動脫節，既沒有養活自己的能力，更不能創造社會的財富。可是他們在社會上的身份愈是提高，生活收益的方式愈是擴大，生活享受也跟著越發奢侈了，依附以生活的人也跟著越發增多了。「一人得道，雞犬皆仙。」他們的家屬也跟着不事生產了。食前方丈，奴婢成羣，都是增加社會的負擔。凡是讀過紅樓夢的人，必定知道賈政和賈二爺的直接間接有數不清的人數；賈府中上上下下，男男女女，找不出一個生產勞動者。凡是讀過孟子的人，必定知道他傳食於諸侯的時候有「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所以論語上以杖荷篠的丈人痛快的罵道：「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爲夫子？」孟子的學生彭更也懷疑老師的生活是「泰」（過分），並且認爲「士無事而食不可。」明代的海瑞在樂耕亭記中也有一段話：「游惰之民，君子之所不取也，世咸以異端游手自之，而不知儒生貴族特甚。自棄於游惰之域，以逞無疆之欲，則凡可侈可淫之物，罔一不備，其爲國夫女紅之害，可勝言哉？視異端游手之害十百矣。」真的，知識份子社會生產最可怕的寄生蟲。知識份子的增加便是生產勞動的減少。知識份子生活的享受愈好，便影響平民的生活水準越發降低。在晚近的學校教育制度之下，中國的知識份子，比較科舉時代，空前的增多，他們的生活形態

與過去並沒有兩樣。但社會的生產技術沒有進步，靠農業的生產方式，產活大量的日益增多的知識份子，必然超過社會負擔的能力，增加經濟匱乏的危機。目前知識份子多數的生活陷於痛苦，也正是生產條件不變而知識份子數量膨脹下必然的結果。

在過去的時代，知識生活與勞動生產是不能兼顧的與無法聯繫的。舊時代的知識內容並不能促進社會生產。今後的社會愈是進步，分工愈是細密，我們不想「率天下而路」，一動所有的知識份子，都同時實行躬耕或做工。所幸自從自然科學發達以來，知識份子可以學習切實有用的知識，來促成生產技術的改進。生產技術進步了，社會便有負擔知識份子的力量，也有提高全體人民生活水準的力量。這條路正是現代化國家中一部份知識份子所已經走上的路和繼續在走的路。在那些國家中，學校教育更是一天發達一天，知識份子更是一天增多一天。但由於產業的發展，各種職業都能吸收知識份子，使知識份子與非知識份子之間不能有清楚的界限。知識份子運用他們的知識和匠心（*ingenuity or workmanship*），在社會中工作，通過生產技術的改進，與生產勞動聯繫起來了，間接創造社會的財富。他們一樣的靠社會養活，但不是純粹的消費。世界馳名的「*IBM*」便是現代知識份子憑藉科學，技術與機器，創造人類福利的成功。像這樣的知識活動愈增加，愈是促進社會的進步，今天中國迫切需要工業化，也迫切需要像這樣的知識份子。中國的知識份子走上這條路，纔能解決自己生活問題，纔能減輕社會的負擔，纔能幫助生產的進步，提高大眾的生活水準，挽救國家的貧弱與紛亂。

從政治的角度看，知識份子應該由依附特權階級走上結合民眾的路。過去知識份子取得生活改善的方式，是應用自己的知識，依附統治階

級，衣租食稅，貪污中飽，合夥分贓，以取得土地的所有權和勢力的支配權。中國歷史，從戰國時代，開始布衣卿相之局，經過漢代的徵辟制度，魏晉六朝的九品中正制度，隋唐宋元明清的科舉制度，「學而優則仕」成爲知識份子唯一的路線。知識份子的出路祇有做官，做官便要依附統治階級。我們讀史記高祖本紀與蕭相國世家，便知道「秦時爲刀筆吏，錄錄未有奇節」的蕭何怎樣投靠劉邦，「依日月之末光，」封侯拜相，「位冠羣臣，聲施後世。」讀史記叔孫通列傳，便知道他怎樣使劉邦知爲皇帝之貴，「因此得到五百斤黃金的賞賜和太常的官。在漢書公孫弘傳中，我們可以看出他怎樣阿諛逢迎，由貧苦書生躍到一位在三公，奉祿甚多」的經過。在後漢書桓榮傳中，我們又可以看出他的車馬印綬，完全是「稽古之力」和「學之爲利」，他的心理是怎樣，旁觀者的心理是怎樣。二千年政治史中的知識份子，大半不出蕭何，叔孫通，公孫弘，桓榮這幾類的典型。等而下之，在政治上投靠外戚，結納宦官，在社會上武斷鄉曲，魚肉平民，在外患時期勾結敵人，充當漢奸，不一而足。他們生活的收益，主要的還是分食統治階級的唾餘，靠統治階級的養養。二千年來，真正最能支配知識份子的思想的只有恩君一個教條。在舊時代中，特權階級直接取得收益的方式，主要的在土地關係上，所以在海禁未開以前，中國的政治和法律，倫理和哲學，也只在維持這種與收益方式相符合的土地關係。知識份子對統治階級是依附的，對地主階級是妥協的；他們彼此的利益都是一致的。凡與知識份子利益相反的任何思想和主張，都不能實現，都必然失敗。歷史上也有企圖改革政治社會的人，例如王安石，但熙豐新法的結果，由於反對新法的知識份子勢力太大，推行新法的知識份子不得其人，最後終歸失敗了。歷史上也有反抗統治階級放棄做官路線的人，例如明末的諸遺老，有的出家，有的行醫，有的務農，有的處館，有的游幕，有的經商。但他們止限於消極的不妥協，並不能積極發動廣大的羣衆，堅持對於外族統治的反抗。而且處館的仍然要教人學八股應試，游幕的仍然是變相的仕宦，出家，務農，行醫，經商，都只能及身而止。「遺民不世襲」的話，在當時知識份子的口中便已經喊出來了。從歷史上看，二千年來的知識份子所過的是很陰暗的生活。

直到晚近，民主的潮流將一部份知識份子喚醒了；他們率先奮起將君主專制的統治形式推翻了。這是現代史上知識份子最大的功勞和空前的成就。可惜他們受了過去依附特權階級的影響，大多數不能站起來和站穩來，仍然是朝抵抗力最小的方向走去，由依附帝王變爲依附軍閥和帝國主義者，由結合地主階級變爲結合買辦階級，保持官僚政治以保持生活收益方式，使民主政治遭受頓挫。他們在民主潮流中用舊方法游泳，至今還未看清楚覺悟工羣衆的力量。例如健全的政黨是民主政治所需要的。現代政黨組織也正是知識份子結合農工羣衆最好的途徑。但自清末民初以至今日，所有在朝在野的前後起伏的政黨，幾乎完全是知識份子的集團。像這樣離開了農工羣衆的政黨，當然不能代表農工羣衆的利益，當然不能形成革新政治的力量，一旦執政，仍然是託庇軍事特權階級的掩護與依靠經濟特權階級的支持的官僚政權。像這樣的知識份子所支持的政權，決不能使民族資本積累，決不能使工業生產發展，決不能減輕人民的負擔，決不能謀取人民的福利。知識份子參加政權便腐蝕這個政權的革命精神，使好的主義和政策變爲一紙空文。民主政治不是一條坦途。知識份子以依附特權階級維持官僚政治的心理來追求民主，不僅是背道而馳，而且還會假民主之名造成許多罪惡。這種行爲是爲進步力量所不能容許的。今後歷史上再不容許出現劉邦朱元璋，也不容許出現墨索里尼希特勒，知識份子並沒有可靠的依附。今後知識份子必須破除過去依附的積習，打消合夥分肥的念頭，認清農工羣衆的力量，通過生活上的享受平等，政治上的政黨組織，工作上的社會服務，與他們結合起來，共同奮鬥，纔有光明的前途。

從文化的和社會的角度看，知識份子應該由壟斷知識的路走上推廣知識的路。在促進生產，爭取民主的時候，知識份子同時需要努力完成普及教育的工作。教育上的不平等，與經濟上的不平等，政治上的不平等，同是人類社會的病態，同是造成少數人剝削多數人那種現象的原因。歐洲中世紀的黑暗，教會壟斷知識特權，是一個大原因。二千年來中國社會的停滯，教育的不平等，知識不普及，知識階級壟斷知識特權，也是一個最大的原因。在今後的社會中，壟斷生產手段的資本家，壟斷政治權力的獨裁

着，斷斷知識的知識階級，同樣的不應該存在了。只有知識範圍的擴大，知識程度普遍的提高，纔能完成人類精力的解放，實現人類不虞匱乏的自由。也應有這樣，知識纔能發揮真正的價值，纔能避免少數人的利用，保證人類政治經濟的平等。我們看到蘇聯建國以來對於肅清文盲的成就，我們又看到英美等國家最近對於強迫教育程度的提高，就可以明白世界進步社會進步的方向。朝着這個方向走，應用知識來工作來生活的人必定一天一天的增加，知識份子與非知識份子的距離必定一天一天的縮短。將來在知識上也必定有少數造詣特別高深的人，但他們不再是特殊階級了，並不會憑藉知識來剝削他人。今後中國的知識份子，應該朝這方面特別努力。

論土地改革

土地問題的性質

根據抗戰以前的調查統計，我國土地的所有權已呈高度的集中：在全國三億三千六百萬農民（廣義的——以下未另加說明者同此）中，領有一畝以上之土地者，不過一億五千萬，至於大多數的農民，都是貧無立錫之地，他們之中，有一億三千六百萬是向地主租種土地，有三千萬是被雇用作為農工，其餘的二千萬沒有土地的農民，既然不能租到土地或被雇為農工，便不得不游離於生產之外，或應僱傭之兵役，或流為盜匪或變成流浪乞丐。同時，在一億五千萬領有土地的農民之中，領有百畝以上的大地主，僅百分之五，却佔去了全部土地的百分之四十五；其次，領有土地五十畝至百畝的地主，也只有百分之九，就佔去全部土地的百分之十九；至於領有土地三十畝至五十畝的富農，約為有地者的百分之十六，佔有全部土地的百分之十七。這三類的農民，合計佔有土地者的百分之三十，共佔去全部土地的百分之八十一。而且在土地分類的統計之中，顯示出這些土地都是比較肥沃的水田或平地。在另一方面，僅領有土地一畝至十畝的貧農，竟佔人口的百分之四十五，其所領有之土地，不過佔全部的百分之六；至於領有土地十畝至三十畝的貧農和中農，佔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五，所領

現代中國知識份子，由純粹消費的路走上促進生產的路，由依附特權的路走上結合羣衆的路，由壟斷知識的路走上推廣知識的路，一步一步的向前進，經過科學與生產技術的進展，經過民主政治的爭取，通過知識範圍的擴大，使知識生活與勞動生產間接連繫，使知識份子與農工羣衆密切團結，使知識份子與一般平民逐漸溶合，這便是知識份子的「蛻變」，脫掉知識階級階級的殼，換來新的愉快的知識份子的生命。這個「蛻變」的過程，是自我改造的過程，要忍受一些不可避免的痛苦，但這是生命力的進化。不走這道路，最後知識階級仍然是要毀滅的，知識份子仍然要遭受時代的總清算。

（三十七年四月二十四日）

黎樹德

有之土地為全部的百分之十三。兩者合計，土地僅及全部的百分之十九，人數則將近百分之七十；加以這些土地，大抵為很瘦瘠的旱田和山地。

從抗戰第二年開始，利用了農民為抗戰負擔重荷的空隙，官僚投機資本，與土地資本相結合，使地權更形集中，中農降為貧農，貧農多被逐離開土地；從東南到西北，瀰漫了暴發戶爭購土地的氛圍，根據金陵大學、農民銀行、四川省銀行以及各政府機關之統計，在川、康、滇、黔、陝、甘、甯、青、新九省，十分之六以上的農地，而且大都是比較最肥沃的，都為佔人口不到百分之三而暴發地主所兼併。據當時地政署署長鄭震宇氏稱：「鄂縣的全縣土地幾乎都被某一個人買光，就是重慶附近也有這樣類似的情形」。

至於偽佔領區，雖乏詳確的統計，但根據各種零星的報導，由於超經濟的掠奪，大量土地被強迫征用，許多良田被漢奸強佔，地權集中於此輩新興地主之手，原來的地主以至於貧農皆向下沒落。勝利以後，收復區的土地，經過一接收，所有權雖略有轉移，而土地集中的基本趨勢，則并未改變。

土地集中的結果就是耕者無其田，因此需要從事於耕作的農民，除了受雇於地主的工外，就是領有土地而無權自主的農民。在資本主義國家，受雇從事耕作

者較多，但在我國資本主義之嫩芽，早經帝國主義的列強之戕賊，迄未獲茁壯成長的機會，根本便缺乏大農經營的前提；且進行着封建的佃租制。大地主爲了便於借取地租，利用一分層負責的強制辦法，次第經過其土地管理人，或特有資金的土地租賃者之手，把土地分爲五畝、十畝，至多不過三十畝的零散方式，轉租給佃農，作生產力極小的原始耕作。據戰前土地委員會的統計：農家經營面積，全國總平均不及十四畝，旱地每畝平均面積不及三畝，水田每畝平均面積約一又四分之一畝。這個統計告訴我們幾件事，首先是所謂平均面積，表示着實際上的面積有許多比它還小。其次，凡屬於地主膏沃土，更割裂爲細塊使用。所以地權愈集中，地方愈好，使用也就愈益分散。

和使用分散并存的，就是沉重的地租。抗戰以前，地租以實物爲主要的形式，但已略呈轉化爲貨幣地租的趨勢；其後，貨幣日益貶值，農產品日益高漲，實物地租更漸變成唯一的地租形式。至於地租數量，一般地說，上等地多於中等地，中等地多於下等地；至地租所佔收穫量之百分比，大抵在勞動力較少的地方或勞動的自然條件貧弱的地方，上等地多於中等地，中等地多於下等地；因爲如果再任意提高地租率，佃農就無法生產，在地主看來，乃爲「過猶不及」。但在勞動的自然條件較好而勞動力較多的地方，其地租量佔收穫量的比率，則爲下等地多於中等地，中等地多於上等田。因爲種下等田的佃農，其家境窮困，特別珍重那土地的使用權，因此也就爲地主提供加重徵收的有利條件。除了地租之外，佃農爲取得土地的使用權，還需向地主繳納押租，據抗戰以前統計，四川普遍的地租爲正產額的八成，有的竟高到九成，廣東普遍爲正產額的八成，江浙普遍爲七成。至於華北各省，因正產物佔總產量比例太高，副產物不足以維持單純的再生產，所以在形式上租率較低，但亦不少於正產額的五成。抗戰以來，各地普遍加租，如成都、巴縣一帶，租額普遍增至九成，有許多地方還超過了正產額，隨着徵實，徵借之加強，農民（實際耕作）——下同此）除了不時應承苛捐雜稅之外，更忍受地主所轉嫁的種種負擔。

農民既沒有土地所有權，又不能使用大量的土地，生產能力無從提高，復承受沉重的地租及其他的需要，於是所謂「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

，豈得無痛苦，却却心頭大」，和現實農民生活對照起來，令人不相信這詩句是對於一千餘年來的所謂「地租」這種基於缺乏土地而演成的現象，迫使農民作爲高利貸的剝削對象。所以高利貸橫行，爲封建土地關係的另一體現。據國立社教學院三十三年調查，四川樂山四鄉之中，除放貸之地主外，有百分之五的農民負債；又據中國經濟研究所調查，湘黔兩省，農戶負債者達百分之六十以上。至於利率，抗戰期間即達百分之三十以上，目前各地地主兼高利貸主，通常以法幣折合銀元或米糧計算收益，農民除負擔形式上之高利外，更承受貨幣貶值或物價高漲的損失。由於這些貸款者即農村之實際的統治者，農民只有被迫在這種重重剝削的條件下償還，於是其再生產能力，也就更加削弱。

綜上所述，當前我國土地問題，仍不脫封建制度的範疇，其具體表現在地權集中和使用分散，中農下降和貧農被逐離開生產，地租上昂和高利貸猖獗等趨勢上，此外，新興之官僚地主取代舊有地主，完全拋棄着下層地主的一美德，愈益強化徵收的超經濟性，農民也因此便由無力生產，被迫作生存競爭，顯現爲現階段土地問題主要的特色。

土地改革問題的提出

由於土地問題之發展到這樣嚴重的階段，反映在論壇上，就形成了當前土地改革問題之提出和熱烈的爭辯。以至於「在言論上，從未敢輕易提出這一問題的大公報，也於四月八日，邀請了十七位專家，特地舉行一次土地問題座談會，並在發表了這次座談會的紀錄之後，著論「如何實行土地改革」，謂「土地改革問題，在客觀上，早已鬧得全國不可開交，而在主觀上，現在實已到大家一致承認非解決不可的階段了」。并謂「土地改革辦法的執行，尤須依據一般農民自身的力量。土地問題的解決，只有交由最近切需要解決土地問題的農民來處理，而且以他們的集體力量來處理，纔能迅速而徹底。過去政府賦賦減租的命令，所以前者能徹底實行而後者全未做到的緣故，就因爲前者利於地主的事，係交給地主料理，而後者利於農民的事，却未交農民處理之故。懲前毖後，我們要實行土地改革，必須同時改進地方自治。今日各地的農村全是地主士劣的王國，在地主

土劣的王國裏，決實行不了耕者有其田的政策。耕者有其田，必須與耕者治其村相輔而行。農民經濟上束縛的解除，非與其政治上束縛的解除同時實施不可。在民主政治行得不切實的地方，耕者有其田的政策，更只是正執行；而完全沒有民主政治的地方，則所謂耕者有其田的政策，更只是紙上談兵而已。在大公報著論之前，新中華雜誌上之社論亦曾指出：「……共軍是以貧苦的農民爲其主幹力量，所以着重土地革命，以土地革命的實行是其勝利的最要的保證。他們的所謂土地革命，在目前並沒有超過中山先生的耕者有其田的主張，而這本來是政府應該早就實行的。如果政府早就實行耕者有其田，那末，貧苦的農民何致被人家用以作爲其主幹力量呢？問題就在於二十年來的實際政治，并未實行民生主義，反而使土地更集中到了新舊地主的手裏，更加甚了對農民的封建剝削。中國農民是最可欺侮的，但是同時也是最難馴服的。中山先生的主張不能把它實際地執行起來，這無疑也是二十年來政治的實質和趨向問題。鄉村政治的實權一直掌握在地主、豪紳的手裏，這是政治的基層，縣以上各級政府，便是建基於這個之上的。這樣的基層政治——乃至這以上的各級政治——的實際內容沒有改變以前，中山先生的「耕者有其田」的主張，如何能夠見諸實行呢？……危機今已逼出了對真理的承認，如何超過二十年來的政治限度，仍是個問題」。在這兩文發表之前，中國土地改革協會，提出「一土地改革方案」，其中謂「我國當前土地問題之嚴重，已成爲一切禍亂的根源和民族生死存亡的關鍵；而政府現有之法令，并不足以根本解決這一問題，如果不急求激奮而普遍的改革，實有非常可怖的後果」。至於「土地改革」的目標，爲「耕者有其田」，并「爲徹底實行土地改革，各地佃農應組織佃農協會，代爲辦理土地登記收繳地價」。此外，馬歇爾對於「美援」之實際效果的看法，也說「基本上，中國政府尚須考慮其農民之土地問題」。

上述三種意見，大體上代表當前論壇上，對於土地問題的三種看法。於問題的根源，它們一致地承認，是由於土地集中所造成的耕者無其田。至於這個問題之所以演變到這樣的境地，土改協會看作是政令上的大病；衡諸其所提方案之內容，似認爲毛病在於過去之政令始終未能乾脆地廢除地主與佃農之名義。大公報的看法却不認爲政令有毛病，而在於地方政

治沒有民主化，使中央頒佈之良好政令未獲實現。新中華則認爲是實際的政治作用強化了封建的剝削關係。

其次，它們一致地認爲應由農民自己處理土地改革的工作。土地協會主張把實施土地改革的技術工作，交給法定的佃農協會負責執行。大公報的意見是必須以地方政治民主化爲前提，使耕者確具自行處理土地改革工作的政治力量。新中華的看法是，應該改變基層政治——乃至於其以上的各級政治的實際內容，也就是說從下而上的政治制度之徹底民主化爲實施土地改革的先決條件和必要保證。

所以，當前我國土地改革問題，不僅已經集中了全國各方面的注意力，而且引起了外人的重視。它不僅關係於中國的前途，而且將影響到今後世界的動態。問題的根源是耕者無其田，其演變之契機爲實際的政治作用，與固有的封建關係之相輔相成，嗣至這一問題在「客觀上，早已鬧得全國不可開交」，而大公報所稱的「主觀上，現在也已到了大家一致承認非解決不可的階段了」。因爲，不僅如馬歇爾所說的，它「在基本上」限制了「美援」的效驗，而且據「土地改革協會」看來，「實有非常可怖的後果」。至於如何始可得而解決，大家也一致承認，應由耕者自己執行，更須以整個政治制度之民主化爲其前提。

至於土地改革之具體辦法，則人各其說，聚訟紛紜。例如土改協會新提之方案，其中心意義，爲使原來的地主，自即日起解除其地主的名義，同時將土地所有者之名義賦予原來租種其土地的佃農，從此不再稱後者爲佃農，而名之曰新自耕農。自改換稱謂開始，實際上，原來的地主變爲除賣土地的債權人，佃農則爲除買土地的債務人，當其債務尚未償清以前，土地所有權交給政府代爲保管。保管期爲十四年，在這十四年中，新自耕農分年償還地價的十四分之一，該項地價相當於原來七年的地租，以生產量計，租率不超過二五減租的標準。換句話說，債務人也就是「新自耕農」分年以地價的形式償還原來地主的債務，每年的償還額相當於過去每年地租額的二分之一。原來的地主收回這份以實物計算的「地價」後，政府不向他「課徵任何捐稅」。此任何捐稅與土地所有者的名義一併轉移與「新自耕農」，不過，「取得土地之新自耕農負交納地稅的義務，在

其他地價清償未完以前，此項地稅不得超過其土地每年生產額百分之十。但在大公報却認爲「一般農民既迫切要求土地，那就老老實實即時給以土地，不再作任何拖泥帶水玩弄手段的打算。任何土地改革辦法應以減輕一般農民負擔，改善一般農民生活爲第一目標。我們在考慮這些辦法時，須設身處地，詳計一般農民的損失，不可草率從事。譬如地稅一項，應不但計及政府的徵實徵借徵購；而且須算到地方上以田賦爲根據的各種攤派，地方攤派的負擔往往遠重於政府的稅額。若干人談這問題，常只講到稅額而不管政府攤派，這是因爲他們只是從政府收入着眼，而不從農民實際負擔着眼之故。農民是最講實際的，不管你如何說法，他們決不會看漏其自身利益」。再說，「以任何名義任農民勞動而地主坐享其成的一切策略，都是陷害地主的辦法」。

上述土地改革協會與大公報之意見，顯然有相當的距離。同樣地，若就其他任何兩種意見加以比較，也可發現其間存在着，程度上甚至性質上的差異。因爲它們代表着各種不同的立場，也就必然會現出各種不同的看法。不過，中國的土地問題只有一個內容，因之，足以解決這一個問題的道路也只有一條。現在，這一問題既已臨到亟待解決的時會，探討那唯一切合實際的道路的意義，當不止於爲論壇湊熱鬧而已。

土地改革的道路

反映着各種不同的立場，論壇上對於土地改革問題的提法，也各不同，據漆琪生氏平行的排比，分別爲下舉的十大系列：

- (一) 途徑——消極改良乎？積極變革乎？
- (二) 過程——一步跳躍乎？分段前進乎？
- (三) 重心——使用問題乎？所有問題乎？
- (四) 目標——國家有其土乎？耕者有其土乎？
- (五) 對象——限用乎？分田乎？
- (六) 標準——勞力平均乎？人口平均乎？
- (七) 方向——大農乎？小農乎？
- (八) 方式——收購乎？沒收乎？

自由論壇 第三卷 第六期

(九) 性質——社會主義乎？民生主義乎？

(十) 前提——極權乎？民主乎？

漆氏把這一連串問題，等量相看地提出，其意或在使問題之易於瞭解。不過在事實上，土地問題是一個完整的問題，構成這個問題最基本的因素只有一個。雖說在發展的過程中，會從基本原因導生出若干枝節問題，而且後者復予前者以相當的反作用。因此，基於任何立場都可以抓住任一枝節問題，強調其爲根本原因，說來亦可頭頭是道。應是以枝節問題作爲根本原因來處理，除了可藉以暫時的達成或種主觀願望之外，惟一的結果，只是強化問題的嚴重性。以往我國種種土地改革的失敗經驗，充分顯示出這一真理。但時至今日，問題的發展，已不再保留如大公報所謂之「玩弄手段」的機會。必須正視問題，根據客觀事實加以檢討。固然任何問題均可作「面面觀」，却決不是面面都可以等量齊觀。

當前土地問題的產生根源既在於封建關係之存在與發展，要瞭解這一問題，也必須從這裏出發去探求。

封建關係之存在，阻滯工業的發展，因而缺乏大農經營之先決條件；同時，反映封建關係之私有觀念，也不容換切地廢除私有制度，所謂「一步跳躍」到「社會主義」而變爲「國家有其土」來實行「大農」經營，不過是架空的幻想而已！因此，今日可能廢除者乃以私有制度爲體現形式的封建剝削關係；同時，既沒有把土地收歸國有作大規模經營的條件，縱然實行土地國有，勢須仍將土地分給個別農民作小規模經營，若政府課之以地稅，事實上就等於保存土地私有制；如果在地稅之外更課之以地租，是無異於以「國家」取代個別地主，而保存原有的封建關係，所以土地改革之目標，只可能爲「耕者有其田」，因之也只會從充實「小農」經營開始。

其次，封建關係之存在，使農民缺乏擴大再生產的能力，也就是沒有改善土地使用的可能性，如果避開問題的核心，而談所謂使用問題，無異於隔靴抓癢，同時，在封建勢力遺項強存在時，所謂「限田」「農貸」，「扶植自耕農」和「減租」等「消極改良」的措施，根本就缺乏現實性，過去無數次嘗試的成效如何？事實具在。即以「二五減租」而論，浙江會雷

厲風行的辦過，因為雖無損於封建政治力量，却有礙於其利益，結果反而明令加租；鄂西也大吹大擂地的幹過，雖然是地主毫無反抗地接受命令，佃農却仍「自動」地照原租額繳納。不久以前湖南益陽嚴言鄉的佃農，奉令組織鄉農會實行二五減租，因其真正照法令辦理，而又沒有取得政治力量的保障，竟以主持人鄧梅魁之被害，結束了一幕時代的悲劇。

所以，當前土地改革問題之唯一切合實際的道路，是從取消封建特權開始，進而消滅封建剝削關係，讓耕者有其田，使之有從小農生產發展到大農生產的可能。而此種可能性之變為現實性，更須具備下列幾個條件：

第一、在消極方面，應在解除現實的封建束縛時，一併解除過去殘存和可能遺留未來的封建束縛。例如由於封建的土地關係，所導生的高利貸催收，其予農民生產之妨礙，殆甚於有限的地租，且累積而成重負。繼續保留，不過是網開一面，且為較小的一面，較之不解除封建的土地關係，不過五十步視百步耳。其次，如果在解除地租之負擔，同時却為農民加上地價和捐稅的負擔，最多只是形式上解除封建束縛，實質上或不免變本加厲。所以不解除過去殘存和可能遺留到未來的封建束縛，僅着眼於現實的束縛，所謂解除，將因之而失去意義。再次，還有一個以積極形式表現而其實為消極意義的條件，就是農民取得再生產之必要的物資保證。例如事實之必需若干耕牛，種子，肥料，農具，房屋，以至於供給再生產之勞力所必需的生活資料等。如果這些條件不具備，不僅生產無法進行，生活也成問題，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東歐國家實行土地改革，農民獲得消極的封建束縛之解除，僅僅差一點積極的保障，終於被這自動地請求地主仍然為他們套上了封建的桎梏。所以為了土地改革之完成，決不可忽視這一個最後的，也是最重要的一關。它是封建束縛之一最不明顯又最緊要的環節。這是封建階級之必然的後果，所以封建階級者也應有負擔補償這一遺憾的義務。

第二、積極方面，應為小農經營發展為大農經營，造成其必要的前提，即工業與正常商業活動的發展。因為要使現階段中國經濟向前發展，資本主義成份為不可缺乏的條件之一，所以土地改革之消極意義，是從耕者有其田到保障生產行程；其積極意義則為保障工商資本之發展，好為農業

展提供必要的前提：如因生產技術的改良，生產力相當提高後所必然剩餘之勞動力——即農村過剩人口之吸收，以及農產市場之擴大等。同時，由於生產力之提高，固然造成部分勞動力，離開農業生產，也因為有擴大生產的可能性而發生土地的要求，在這兩方面的要求之下，準備脫離農業生產者和繼續從事生產者之間的土地自由買賣，和以社會平均利潤為標準地租的租佃關係，在現階段內，仍有保留之必要。

是以當前土地改革之真諦，既不能是廢除私有制度，也不能是完全廢除租佃制度，只能是使那在私有制度和租佃制度形式下的封建關係的內容，變成沒有特權和超經濟剝削的新生產關係的內容。同時，它也只能是工商資本發展的保障。所以土地改革之具體實施，只能是一方面保證所有願意從事耕作（不論原來為地主抑為貧農或無業者）獲得均等的土地所有權和使用權，也只能由擁有剩餘土地所有權者，出讓其剩餘部份並在可範圍內，給予持受土地者以維持再生產之必要的物資保證——即保證其費用權，以解除本身之封建剝削者的地位。而在另一方面，土地改革之具體實施，只能是保障工商資本之發展，不論資本之所有者是否具有地主身份，都只能一視同仁。

最後，關於保證所有願意從事耕作者，獲得均等的土地所有權。論者每以如何「均」及如何「等」為爭辯的焦點。由於技術條件限制，平均土地所有權，不可能以全國為範圍；且為避免遭到農民之封建意識的反作用，只能分別在各個較小的區域內求其平均。同時若僅在能夠耕作之中間，求其平均，則不能直接從事農業生產的農民家屬生活，就成為躬耕之農民的負擔，足以妨礙生產；所以又以人口平均為標準。至於「等」的意義，根據實際情形，則只能是以土地肥沃度為係數的加權平均。

上述各端，則將差之毫厘而失之千里。而走向這一道路，自不免遭遇封建力量之強大的阻力，因此這一條道路之開拓，仍有賴政治制度之民主

國庫券能吸收遊資嗎？

李伯洛

籌備已久的短期國庫券，在其提出法案於立法院時，雖曾遭受反對，但行政當局抱定非發行不可的決心，終於正式在市場出現。

短期國庫券的主要性質，在於政府以一種發行時附有折扣，到期時保證照額面付現的票據，來吸收市場上的一部份資金。實際上就是等於由政府出利息向市場借款。這個辦法，在我們看來，並不是解決今日的財政困難，和澄清金融界紊亂情勢的有效政策，甚至也說不上是有暫時效力的金融調節手段。這個辦法，雖然在學理上沒有什麼不好的地方，很多國家，也都曾發行國庫券渡過財政經濟上的難關；但是目前的中國，已經不能有效地實行這個辦法，因為通貨膨脹的程度太深，人民已信任實物，而不會相信任何變相的法幣。國庫券雖然附有一折扣，但這個一折扣，並不能恰好彌補一定期間內法定法幣的貶值數，即使能夠彌補，人民也覺得不如囤積實物的可靠與安全。國庫券發行的時機，至少已遲了一年多，如在一年半以前發行，那時通貨膨脹較現在緩和，一利息一也被人重視，政府倘能確實顧全信用，國庫券或能發生收縮通貨的作用也未可知。現在法幣貶值得如此慘厲，連普通市場上的利息也快要不能補償幣值跌落的損失，政府豈能以一紙國庫券來吸收市場的資金，延緩其購買力的使用？然而，政府對國庫券却抱有很大的希望，以為拿政府的信用做後盾，並且以可靠的息金來向市場借款，一定能誘致人民的購買。一些會計和執行這項政策責任的所謂經濟專家，更是樂觀得近於幼稚。他們以為短期國庫券一旦拋入金融市場，就能毫無問題地吸收大部份遊資，抽緊銀根，從而減少投機，使物價逐漸趨於相對地穩定。國庫券的發行，基於這種自信，這種宣傳。這種自信與宣傳，馬上要受到發行結果的考驗。事實會給予怎樣的答覆呢？

我們認為在此通貨極端膨脹，物價不斷高漲的情形之下，短期國庫券的發行，一定不能達成大量吸收遊資，間接穩定物價的任務，國庫券本身的推銷，也一定大有問題。原因不僅在於上面所說的國庫券本身不能取得

人民的信任，還在於國庫券的發行，不是從正面去消滅遊資充斥的原因的辦法，而是企圖減少遊資作害的補救手段。在某種情形之下，遊資充斥的現象，未始不可由量的吸收達到質的改變，即以吸收的辦法，慢慢使其消滅。但以目前情況而論，我們敢斷言這是一種奢望。今日市場上遊資充斥的原因，除通貨濫發，物價狂漲而外，最重大的莫過於生產衰落。遊資的定義是從生產衰落而來。生產部門不能變成投資的對象，不僅喪失其消納社會資金的能力，且儘可能地將原有資金排出生產的行程。一切在生產行程以外的資金，形成廣泛意義的遊資。生產怎樣的萎縮，遊資必然怎樣的鉅大。除非使生產變為最有利益，誘發社會資金投向生產部門，我們不能想像有更好減少遊資的辦法。就是政府運用減少遊資的金融政策，例如發行國庫券，也必須以促進生產為政策的必要前提。目前生產的衰落，原因雖然複雜，但除物價波動，通貨膨脹的直接影響而外，未曾不可求出一個最終原因。這個最終原因是政府的軍事政治措施造成的，不待多講。試問在今天這種局面之下，政府對於這個最終原因，有無消除的準備？誰也看得出來，政府不惟無此準備，且已陷於不得不擴大製造這一原因的窘迫情勢中。在此情勢之下，社會生產不能不受通貨膨脹和物價狂漲的摧殘，政府也無法執行一種鼓勵生產的政策。甚至政府吸收遊資的目的，也不能不限於一種消極的挽救財政危機的性質，與促進生產一事了不相干。然而，愈是如此，生產愈要萎縮，遊資愈將充斥。國庫券是沒有什麼神奇的力量能夠解決遊資問題的。

茲再補充說明國庫券本身不能暢銷的理由。國庫券唯一用來誘致購買者的是折扣牌價，折扣牌價所標示的折扣率實際上就是利息。例如五月十七日發行的兩種國庫券，其一定五月底到期，計十四天，按九四、五折發行，約合月息二角三分；另一種定六月十五日期，計二十九天，按八五折發行，合月息二角四分，其折扣牌價將逐日加以變動。實際上，折扣率既等於利息，就必須十分接近普通商業市場貸款的利率。否則國庫券便不

被歡迎，因其首先就不能與普通的商場貸款競爭。但折扣率如果等於普通商業貸款的利率，後者必會提高利率以求與之匹敵。這時候，折扣率是否也要隨之提高？如果提高，則市場必出現高利率，國庫券可能為投機者的對象而暫時收到吸收一部份遊資的效果，但高利率對於尚在苦苦撐持的工業家有絕對的妨害，其本身且亦不能長久維持。如果不提高折扣率，國庫券勢將無人購買。

其實，以信用貨幣形態出現的國庫券，雖然附有可按照市場情形來調整折扣率（即利息）的保證，但在投機家看來，購買國庫券仍不及囤積普通商品之有利。即使就理論來說，國庫券應該可以吸收普通城市居民的小

沉痛話經濟

一、

任是什麼事，只要一見慣了，便都足使人麻木；人們之於談虎色變的漲風，現在也視為事所當然，理所必至；甚至於有時還對某一二種尚未波動的物價，感覺驚異；這就是已經到了一個麻木的程處。

時間是最和人開玩笑的，回憶每能發人深省，無論是讀一讀幾千年來的歷史，或翻一翻幾個月以前的報紙，多少總可以領悟點時勢推移的軌跡，一醒醉生夢死的沉度。

歲尾年頭，本市的條金每兩是八百九十萬，銀元不過八萬二千，美匯八萬九千，熱米才八十萬，煤球十三萬；現在還只過了四個月另十八天的光景，條金已是每兩五千六百萬，銀元五十五萬，美匯官價四十七萬四千，熱米六百萬，煤球四十萬；最少的漲了不止三倍，最多的是在七倍以上。即以五個月漲三倍計算，從七七抗戰到現在是一百三十個月，今日的物價，應為當年之二萬五千餘倍；其實上海最高的物價，也還沒有達到民國二十五年的一百萬倍；可見得今年的漲勢實屬空前。同時，這一漲勢，又非絕後不可；因為使這一漲勢繼續發展下去，假定還有兩年才過太平日子的話，那時候的物價將已漲到現在的七百二十九倍；如果是按四個

類款項，但這一點也要看物價波動的情形是否劇烈而定。若按近兩個月來物價波動的頻率，則購買國庫券，仍不及馬上購買需用物品之合算。因為物價在十天半月之內，說不定就會跳躍一倍半倍，而利率的提高決不能趕上物價。

在通貨膨脹猛烈進行，物價不斷跳躍，生產極端衰落的情勢之下，想以國庫券來吸收社會遊資，實為很幼稚的幻想，即令單純以和緩通貨的發行，挽救當前的財政危機為目的，也非可靠的辦法。至於減少投機，安定物價之說，不過是美麗的謊言而已。

黎少岑

半月漲七倍多計算，更將駭人聽聞。這四個多月的物價之不止上漲三倍，是千真萬確的事，像這樣只在四個多月中漲上三倍，不像米糧一張便是七倍多，就一個很短的時間看來，也許還可以說是較勝於彼；但一加以時間上的累計，其所得出的結果，似乎便難以令人置信。譬如說現在的大餅是萬元一個，如按五個月漲三倍計算，說兩年後的大餅會要七百二十九萬個，好像是妖言惑眾。然而回頭計算一下，年初的大餅，還只一千元一個，不到五個月便漲了十倍；照這一比率更是推算不得。

五個月至少漲三倍的這一比率，在今年不止於投機市場上的黑市波動，還可以找出許多官價來作佐證。美匯從八萬九千元放長到四十七萬四千，超過了五倍。年初公教人員的待遇調整，還只在擬議之中，如武漢區的生活指數，在一月中才決定為六萬五千倍，隨後改為八萬五千倍，現在說可能到三十一萬倍，增加率在三四倍之間。元月十二日公佈了公用事業價格計算公式八種，賦予公用事業之自由加價，以合法的依據。武漢輪渡由千元加至三千元一案，剛好趕上三十五年底通過，從大年初一起，三千元的票價才能算得是官價；其後連續調整到兩萬元，在六七倍之間；據說按公用事業價格計算公式要加到三萬倍，那便是十倍。

新年元旦，開始發行五千元關金，接着千元鈔便發生了拒用的風潮，

把物價提到起碼以萬為單位。在戰前已有過百元的大鈔，即拿最通行的拾元計算，到分位是相隔了一千個單位；七萬元僅為千元之一百倍，要說是十萬大鈔騙逐了千元鈔的話，似乎是不大合理。而且，直到現在，十萬元和五萬元的鈔票還要算稀物，跑單幫運現的是求之不得；通常在市而上的流通單靠萬元鈔，和一小部最討人厭的伍千元鈔。論理等碼的級距已嫌太短，小鈔既被拒用，似乎正需要更大的面額。

在八年抗戰的期間，只是增多了百元鈔的發行，千元鈔是抗戰末期中才出現的新票面。剛收復時，連角票都搬出來使用，物價很回了一點頭；三十五年二三月間物價才開始蠢動，在整個一年中，照日用所需的各種貨品的價格看來，大約也只漲了一倍左右，也有達到兩三倍以至於五倍的。三十六年一月十七日，始有三十四年印製之五千元大鈔出籠，那時已經是議論紛紛；其後發行萬元大鈔，並曾經監院之反對，與財政當局之一再否認；直到今年元日始發行十萬大鈔，這三級跳遠非抗戰期間之僅增發千元鈔可比。從這一點看來，儘管有所謂財政專家在說大鈔之發行，決不會刺激物價；卻再也不便於發行更大的面額之苦。

說物價漲便等於說法幣跌，目前的一萬，只抵得戰前的幾分，因為即按五月份文武職人員生活補助費分區支給標準計算，所採取的生活指數，也在二十一萬倍到八十萬倍之間；實際上的物價指數遠遠過於此。這就是說，按貨幣的實值計，目前流通市面的是只有分子和角子。所以萬元鈔正步着千元鈔的後塵；縱說當物價還在百萬倍大關以內的時候，尚不失其為輔幣的作用，可也嫌其過多；假如一有更大的面額發行，或者十萬元和五萬元的鈔票再多一點，便有被逐出流通過程的危險。

就從文武職人員的待遇一月一調整看來，也可以反證出物價的問題之日趨嚴重；以前是三個月一調整；現在已經是一個月等不得一月了。既然物價之漲，是由於幣值之跌，則為了物價上漲，追加預算，以至於更增發行，再推動物價上漲；互相影響推動，構成惡性循環；而循環周期，又一次緊迫一次，那就要就心有一天接近通貨膨脹的極限。

平抑物價的基本辦法是停止通貨膨脹，而停止通貨膨脹的主要前提，又是平衡預算，如果無法平衡預算，任何整理幣制的理想均將趨於幻滅；甚且為通貨膨脹之另一形態，有利於通貨之繼續膨脹。如前所述，目前通

貨的種類還覺太少，主要的只有萬和十萬兩種；換發新幣，假定只具備分角元和拾元四級，便不啻再加發百元和千萬的大鈔；而且，數字之名目小，膨脹更出於不覺。

二、

膨脹了通貨，再來想辦法緊縮；膨脹了信用，再來想辦法抽緊銀根，都是些捨本逐末的辦法。這幾年來，許多辦法都沒有行通，徒只給投機者造下了很多的機會，無益而且有害。譬如拋出黃金，并未能收法幣回籠之效；即至停止拋售，黃金之投機市場已無法復閉。開放工貸，固然便利了套取低利貸款之徒；停止工商貸款，又置正當的工商業於周轉不靈的絕境。凍結外匯匯率，是徒然賠累出平準基金，并給有力者開一獲暴利的方之門；即至改為追隨市價調整，仍無法消滅黑市；且因調整頻繁，刺激物價上漲。所有這些辦法，都對，也都不對。對在是不乏相當的理想；不對在其並非根本的辦法，所以才勞而無功。

金融管制，標誌着近幾個月來的經濟政策，如本市的金融管理局，即在元日成立。當時承大漲之餘波，利用金融斷流和抽緊銀根的辦法，會使一部份投機者感覺倉皇失措，物價確有一個時期是顯得平穩，很令一部份過於樂觀的人士，抱物價可以從此平抑的幻想；主管人員亦被稱頌多時。

無奈游資之泛濫，既非點線之可能控制；且既曰游資，也未必便都在行莊往來的行程之中，可能予以凍結，單在行莊中堅壁清野，并守住幾個有限的據點，封鎖幾條交通路線；是則不能對游資予以聚攏，也無法完全遮斷游資的通路。而且，在行莊中實行堅壁清野之後，正好促使游資之東逃西竄，其勢更熾。臉上長一個小疔瘡，一抓破便有於頃刻間蔓延於滿臉之虞；檢查行莊，與及以後之停止遞延證交，都只是抓破疔瘡的辦法。

對付游資的這一種作戰方式，為了只有點線的扼守，沒有全面的機動的配合，固然是難以獲與功效；但這也與軍事作戰一樣，離開正面的接觸不說，仍有其軍事行動上的間接影響，即如在圍城中和封鎖線上的人民，是每在敵對者受到懲罰之前，先忍受着軍事時期的痛苦。在工貸停止和金融斷流之後，正當的工商業之莫不感受窒息，情形亦復相當。

一臨到這樣的情形，便有進退維谷之感；譬如說，戒嚴既感到人民之不便，解嚴復就心到會疎漏了對於敵對者的防範。在工商業的迫切要求之下，貸款是漸次開放了；但在目前生產不振，金銀黑市的猛跳遠過於拆息的前提之下，即使在貸款的最終目的還是爲了生產，是否便爲了要保持幣值，或者彌補生產的虧耗，偶爾也湊熱鬧做一點投機買賣，似亦在情理之中。又如調撥一點頭寸來置辦日用品，是否也會像上海那一次糧貸之掀起物價暴風，也成疑問。譬如本市的民食調配委員會即曾遇到過這樣的困難；在本市收購，既恐怕更致刺本地的糧價；到外埠去收購，而外埠也一樣怕的激刺糧價。最理想的辦法，是分散到內地去收購，却又會增加收購與運輸的費用。這決不能怪收購和調配工作的本身；而對着現實環境，任有如何理想的辦法，盡如何最大的努力，都有着所謂戴罪窩子唱戲的苦衷，一切困難的中心癥結，全在於通貨的實值之可變性；一擁有多量的通貨在手，存放着既會自動的貶值；拋出去又促使貶值之過程更速，使得未能即時拋出去的通貨，又更加貶值。人人都愛錢，又人人都願手裏存錢，這是一個極大的矛盾；因此那一個地方有錢，那錢本身便會興風作浪，與所有者之心願無關。無錢不能作事，有錢又會惹出風波，畏首畏尾，身其餘幾？

限制匯款與運現，原爲防範游資之阻擾，但有力或狡黠者仍不乏往來調撥之方，游資之流向，仍決定於投機之是否有利。并未絲毫受到管制的影響。早先認爲上海的游資，是經由本市，南逃港穗，所以通常上海匯本市，與本市匯廣州的匯水均較高昂；反而是在管制期間，又發生了倒流的現象。前時廣州匯款本市，與近日本市之匯上海，均非內扣而爲外加，即證明了游資之或北或南，或東或西，仍然是輪來轉往，運轉自如。當然這並非說沒有一點兒限制的效果，對於正當工商業之往來營運，確有着相當的阻滯，故據報津滬漢穗四地的金管局長，即爲了這徒使外商因時乘便，對於我國之工商業發展，大爲不利，而有請求解禁之議。解禁後也許更便於游資之泛濫；但永遠地斷流，也只是因噎廢食。

再談到金銀黑市之取締，也總算是雷厲風行，結果金銀行市仍然是一日數波，不斷地在領導物價上漲。任何人撫心自問，在這樣一個時候，假如手中今天還有餘錢的話，恐怕便要考慮到買金銀了。從去年下半年起，

任何物價都沒有金銀漲得快，縱說不是想發財，只求能餬口的話，至少也會被拖進銀元的買賣之中。譬如一個月領一次薪金，完全買柴米油鹽物缺乏零用，存行莊又嫌其過多，換上銀元放着，等待必要時再換，幣值總算給保持下來了。論理，如屬勞力勞心之所得，不使其微薄的收入，再受貶值的損失，應該是天經地義的事；然而這竟會助長了投機買賣的凶焰，究竟是誰的罪過。

三、

發展生產事業：必須要有市場，想念到中國工業發展的前途，第一個困難問題便是國際市場。明戰爭來爭奪市場，或使用經濟侵略的方式，本不合理；但以幼弱的工業，要在國際間打開一條銷路，確也並非易事。老早更計算好了，勝利後在日本未曾恢復對外貿易以前，趕緊先到南洋一帶去打一點根基。正爲我工業在國際市場中之唯一出路。不幸蹉跎自誤，在戰亂中抵消了國家向上發展之有生力量；現在日本是已經又起來了，據說本年一月間日本的棉布存庫即達三億二千萬平方碼之巨，正圖以賤價傾銷，壟斷星洲的市場。價格可能比港布低廉一半；日紗和美紗，也限制了我國紗的銷路，如香港原擬向中紡訂購二十支棉紗六千件，讓價爲港幣一、三三五元，卒因美日紗之僅索價一、三〇〇元，以致少訂出三分之二，並將售價縮至一、三二〇元。

以前紗布曾經禁止南運，爲了不使國內的紗布價格激漲，確不料紗布之漲勢仍熾。且紗布花已被視爲投機之標的物，既然產品沒有出路，原料和半製品的價格之波動，是反較成品爲甚；大抵是布不漲紗，紗不如花。這說明着兩種反常的現象，一是生活之無利可言，愈加不合算；二是大家購買力之納實特弱，貨物之愈以大眾消費爲對象者便愈沒有買主。在一般生產事業中都不乏此種情形，但以花紗布最爲顯著。

現在和其他管制政策的發展一樣，紗布南運，終告解禁；只是爲時已晚，銷路便大成問題了。

假定當初工業能臻臻日上，自是向南洋方面發展；目前除了光景，黯淡的紗布南運之外，再便是資金南流與工廠南遷；但這並非爲新興的工業開闢新大陸，只是爲了保存一部份的財富來寬三堪察加而已！

國內各廠正在醞釀南遷的運動，如上海在這幾個月來陸續往香港的工廠，即在十家以上，計有太平洋及新華兩處，大南、南洋、香港、偉倫四棉紗廠，還有些正在搬運機械之中。即如本市之第一紗廠，亦傳有在南方設立分廠之說。有關方面，曾對此加以否認；但東北華北的工廠之南遷，終屬事實。資金總是要向安全和有利的地帶發展的，香港方面雖不一定有利，在敏感的企業家看來，也許是認為比較安全。

資金南流，是早在工廠南遷之先，一方面是由東北而華北，華北而上海；一方面是由上海漢口而廣州香港；兩者並非一氣呵成，但就大體上看來，可說由北而南以至於逃避國外的一條路線。上月中旬，只一兩日間廣州市內便匯來了五六千億元的游資，被凍結的超額現達六十九億，物價在半月內提升百分之八十。究竟有多少資金從這裏逃了出去，還不容易查出一個確數，黃金之為港澳進口的大宗，更為資金之逃避，增加若干助力。

東北流通券禁止在關內通行，與及滬穗的匯款運現之限制，都為針對着資金南流而發；現在東北流通券，已經東北人士之一再呼籲，准予自由入關，無限兌換；再加上紗布南運與工廠南遷之實物的南流，在在都可能匯為巨流，擴大資金南流的聲勢。

在以前，一般物價之隨美匯波動，已為一不合理的現象，因為大多數貨物之成本是與美匯無關，只是通過美匯之變更，顯示出法幣之貶值，乃至掀起派風。最近影響物價的因素，美匯似已不及港匯為有利，港匯波動，比美匯之變更，在市場上更容發生反應。香港總督謂已有人考慮香港可能代替上海為工業區的問題，或屬過甚其詞；至少香港目前無形中已成了一個經濟中心，港幣的投機買賣，也代美鈔之買賣而感極一時。

去年一月中，法幣十萬元可抵港幣八十八元有幾，這年終只抵三元，計有約近三十倍的變更，高過同期間上海批發物價指數的增漲率一倍。近來法幣十萬元，已徘徊於港幣六七角之間了。

在資金南流的過程中，通過工廠南遷的形式，更將生產資金，游離而為游資。同時，愈南流也愈失其為民族資本的性質，以圖苟安於外力之下。各地金幣局的負責人，已經從實際工作的體驗中，看出來了金融斷流，是徒使外商獨得融通之便，有利於外商，恰好只窒息了民族企業。同樣的

情形，是早經存在，如在新公司法的前序中，曾指陳限制外國公司之在我國內設立分公司，必須以其本公司在國外確有營業者為限；却不料竟有這樣的奇蹟，條文中恰好沒有限制其本國外確有營業的字樣。如此說來，只要打上一塊外國分公司的金子招牌，便不知要得到許多便利，民族企業之日帶買辦的性質，自是意料中事。據說三月份的人超，已達三萬餘億元，比較上月，幾增加一倍，再加上走私之商難禁絕，使得已經是貧血的國民經濟，還要繼續大量的出血，情形是相當的嚴重。

四、

推拖這一官場中的手法，是以拖為主，推拉為輔，其所以推或拉者，就為了達到拖的目的。的確，有許多問題是可能讓時間解決的，拖得久了，一了百了；但經濟問題，却萬萬的拖不得。沒有一個具體有效的措施，此連續的奢望來自自我陶醉；反而鬆懈了應有的努力，情形只是越拖越壞。而且壞也只能壞到一個相當的程度，不能使它拖得一個無法再壞下去的時候。

經濟情形之惡化乃盡人皆知的事，許多認為可能阻止其繼續惡化的辦法，差不多都使盡了解數，結果有的徒勞還糟，不僅無益而且有損。現今所剩下來唯一的王牌是改革幣制；但希望用美援來改革幣制，有似於急驚風落了慢郎中；一筆貸款，從擬議到通過施行，其間不知究上多少圈子，還要分期撥付，劃定用途，不能一次很痛快的使用。至於用白銀貸款的說法，有識者均認為這不是合於理想的辦法；今日再回白銀市場的風雨飄搖之中，又從何能得到穩定。

剛收復時，物價下落，連角票都搬出來使用，並未費一點穩定幣值或平抑物價的力量，有一條不甚為人注意的經濟消息，是國家行局，曾帶在佔領延安之初，也須運送小鈔去那裏使用；嗣後延安和瀋陽成為全國物價最高的區域，當然是為戰爭的影響。就經濟而言經濟，這裏有兩點值得研究的地方，第一、是當物價自動下落，幣值自動提高的時候，應再以人為的努力；縱說不能使其更向好處發展，至少要不使他再壞下去。第二、是從通貨與物價的起伏激盪之中，默察出經濟惡化之最基本原因，設法與以消除。就廣義的說來，投機並不算壞事，投機取巧以自私，固屬不好

；但如把握發展的契機，適時地向有利方向的活動，又確較脚痛醫脚，手痛醫手，與陷於搖擺的工作，要有效得多。

最近有幾件反映投機市場心理的報導，頗值得人玩味；分晰那不利於投機之機，抵禦這一機會，未始不可能因勢利導，制止經濟之繼續惡化，據大公報發佈消息，早先副總統的決賽，對商場極為刺激，大小商號都收聽決選廣播，誰勝誰負竟成爲物價漲跌的尺度。最滑稽的是證券市券，股票行情的昇降，幾乎跟了國大開票喊聲跳動，一起一落，上海商人的神經質，於此表露無遺。其實，不止上海是如此，差不多在各地的商人，都有這一種看法，本市銀元之出四十七萬大關，即適在三位候選人先後宣佈放棄

競選之時；甚至連鄉下來的，平時間不大過問政治的人，也對此極爲關心。老實說，這並非是兩位決選者之誰優誰劣的問題；而是一般人以爲用人或可行新政；且已有一篇美麗的謊言，即使不能立刻兌現，亦足差以自慰；最重要者的是爲了不願再見有新的裂痕發生。這些理由，都是於投機者不利的機；要反投機，便不可輕失此機。最近美蘇有直接談判之說，據報滬市物價也爲之一落，即見國內的反應冷淡，馬上又恢復了；這又可見得投機者之不願見有世界的和平。

踏破鐵鞋無寬處，得來全不費功夫，靈丹妙藥，儘可於輕易中得之，凡屬投機者所不見之機，我皆舉而成之，焉見其無成功。

美國的政治風氣

Arther Schlesinger, JR. 作
隗 穉譯

愛默生 (Emerson) 在一世紀以前寫過：「誰看到我們的政治之卑下，不在心裏慶幸華盛頓早已穿上壽衣，得到了永久的安全，不慶幸他已經甜蜜地躺在墳墓裏，心裏懷藏的對人類的希望還未被壓碎？」

美國知識份子對於政治之卑賤，時時感到嫌厭。這是一種病態的信念，認爲公共幸福與國家福利已無可補償地，被個人野心與私家利害所吞噬了。在平靜的時代裏，這種信念驅使知識份子全部逃避政治。在歷史無法忽視的苦難時代裏，一些知識份子就準備根本抹煞政治；他們揮別了民主政治中被斯福德 (William Z. Foster) 稱爲「可笑的談話會」的一些瑣瑣屑屑的東西，企圖用以代替壯烈的紀念碑似的行動。

至少，在這一方面，法西斯蒂和共產黨的控訴，是沒有什麼不同的。無疑地，對於英雄主義的懷念，對於掃蕩腐朽的舊秩序，在勇敢的新基

礎上建立社會制度的急劇行動之夢想，已爲富於理想，欣慕權力，厭惡民主政治者復程序的人，創造了複雜而且有力的滿意條件。鐵托 (Tito)、南斯拉夫獨裁者們辦事順手得很；即是民主政治的忠實讚美者，看到季米特羅夫 (Dimitrov) 保加利亞總理) 所發的，社會黨最好停止批評預算，否則就會遭逢彼得可夫 (Petkov) 同樣命運的聲明，拿來和杜魯門對參議員塔虎脫 (Taft) 更不用說對眾議員泰柏 (Tager) 的內容忍相對照，都會有上下床之感的。東歐的一革命，縱令不免收買和恐怖，然和英國工黨政府的退讓和妥協比較起來，或許是更英雄的。至少就瓦格涅式的意義 (Wagnerian sense) 瓦格涅爲德國十九世紀大劇作家其作品多以古代傳說中之英雄爲題材。) 說是如此。

能不要政治。一個現代俄羅斯的最明敏的觀察家說：蘇聯的政治有似乎男學校裏的同性戀，許多人在如是作，可是誰也不願意被發覺在如是做。只要對這些令人駭汗的事件觀察一下，就會覺得，民主政治所提供的正常的出路，是有其確定的價值的。

可是我們也不能否認共產黨在工作效率方面的成功。問題在於我們願否付出求急效的代價。我們必須面對這個事實，就是民主政治不願以激烈手段，對付事情，至少，在他們未和敵人正面衝突的時候，是如此的。換言之，如果我們想到民主政治，也就必須想到含有退讓與妥協，平庸與偶爾的貪污的政黨政治。正如麥克米克 (Colonel Mc Crnich) 是新聞自由的代價一樣，傳聞普史密斯與吉拉爾特史密斯 (Boss Crump and Gerald L. M. Smith) 賀甫曼 (Clare Hofmann) 福安 (Harry Vaughan) 同德萊西 (Hn-

Sh De Laey)等，是政治自由的代價。總之，如果我們看重不同的意見，容忍與妥協，則無論怎樣，我們都不嫌其過火。

我寫這篇文章，是從看重不同的意見，容忍與妥協的信念出發的。因此，如果一開始就攻擊美國政治中的令人痛苦的方面——如居然有史密斯，福安，復拉西這些人——，那就太愚蠢了。因為這樣的事，是必須用民主政治的基本價值，才能對消的。但是同樣明顯的，在美國的基本結構之內，可能而且必須求得更具智慧，更可靠的政治。假使我們不願改變原則，我們就一定能夠提高我們政治生活的道德水準。

所謂政治風氣，大體上關涉到政治的言論與行動。成熟的政治風氣，意味着事實的尊重，幻想的避免，衝動的抑制，和具有對過去與將來的意識。無疑地，這一些性質，在我們這樣的一個過渡時間裏，是很難達到的。然而即令我們的歷史，也斷難寬恕忽視事實，散佈幻想，隨願衝動，歪曲過去，敗壞將來的。我們的政治思想，無論右也好左也好，其特點正在於對將來之重視哩。

一個可靠的保守政黨的缺乏，正是決定我們目前政治風氣水準的重要因素。華盛頓，漢密爾頓(Hamilton)，亞丹斯(Adams)的聯邦黨，在鼎盛時期具有真正的國家福利的意識與超越直接階級利害的考量。可是自從聯邦主義消逝之後，美國的保守黨派，就只求他們本身的急功近利，從不顧及國家利害與社會福利了。美國政治風氣上常常反復地發生的偶發事件，是一個具有高

度社會責任意識的保守黨人，為一個財閥的短視的政黨所束縛。許多這類的偶發事件裏都有亞丹斯，在我們這個時代裏，則有赫斯，史丁遜，威爾基。

英國的歷史，顯示出一個可靠的保守主義的價值。右派之能夠同意必要的改革，是英國穩定的重要源泉之一。比方說，英國保守黨之對待社會主義，較之大多數的共和黨人之對待新政，就不死硬得多。我們的右翼，對於預料的極微小的改革提議，都會恐怖地拚命反對；企業界總是在很長的時間中，要保衛美國的生活方式的。其結果，就在美國的政治上造成了一個不安定底源泉。像一九三四年到一九三六年那樣的無可避免的時期裏，保守派之反對改革，達到了歇斯里的程度，甚至於在幾年以後的他們自己看起來，都似乎是可笑的。

老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恢復了共和黨的生命力與責任感。可是將無所屬的墨斯艾墨達比集團(Morse-Aiken-Tabey group)以及永遠不可思議的紐約論壇報暫置不論，羅斯福史丁遜赫斯一脈相傳的傳統，僅以較不堅強的形式，保存在范登堡參議員，德爾斯(Fohn Foster Dulles)，小洛季(He Younger Lodge)以及其他少數幾個人身上。他們都很嚴肅，都對提高共和黨的政治水準有貢獻。然而還並不能使這些少數的開明人士遠離共和黨基本原則的腐音氣氛。這種氣氛，使塔虎脫參議員雖然在私人交往上是一個有理性的和藹的人，而在公共場合裏，則其行事和惠利(Wherry)參議員並無二致。

近年來，可靠的保守主義，似乎真多多少少轉向民主黨來了。少數的企業家，他們看出新政之不可避免，同時對於它的許多改革，表示歡迎。被羅斯福邀請合作推行新政。例如哈里曼(Harrell Harriman)，在國家復興方案實施之後

，就曾經担任過公職。他的時常改變的服務環境，與他的多感的良知以衝擊，結果，他從社會主義的英國與共產主義的蘇聯的對照中，吸取了豐富的深刻經驗，把自己造成了一個價值極高的公僕。然而右翼的那種特有氣氛，使得哈里曼的可靠的保守主義，在許多共和黨人的眼裏看起來，成了一種危險的發狂的自由主義了。羅斯福的另一門客福勒斯退爾(Fames V. Forrestal)，同樣地代表一種熟諳世情的保守主義，雖然比較哈里曼要頑固些，缺少社會意識些，然而較之那些共和黨人們，有才智多了。

我國保守黨派之脆弱，在歷史上，是為進步黨派的奮發所平衡了的。在危急時期，美國人通常在深信自由與民主的人民中間，發見出真正的全國領袖，新政不過是自由份子所發動的，以拯救被圍攻的資本主義為目的的，許多應援軍隊中的最近的一個而已。

這種政府負責的傳統的結果之一，是導引了一種強烈的實踐傾向到美國的自由主義裏去。在其良好狀態之下，我們的左翼曾經提供過有效的政治領導，和有效的行政管理；它曾經兩次領導我們的國家通過了最嚴格的試煉——二十世紀的戰爭。然而也就是這種實踐才能的存在，使得左翼傾向於分裂為一方面是政治家與行政的人才

，一方面是感傷主義者和理想家。前者把自由主義看成實踐綱領，是不久之後就可以付諸實施的。後者則把自由主義當作私人纏綿與頓挫的發洩。新政表示出行動家對牢騷家的暫時的勝利。

如果我們問：一九四八年的進步觀念，是否還具有新政時代的生命力？很明顯地，從政治的意義來講，已經沒有了。在我們的國家裏從來就沒有有一個自由政制，會延續。十二年乃至十五年之久，而不衰弱與轉向的。民主政治的不斷磨耗，便進步的推遲歸於失敗，遭受歪曲；而我們的實驗主義的傳統，也常常使得我們的進步領導，在一旦遭逢着直接恐慌的時候，無所措手足。杜魯門表現得很少具有自由主義的天性；他只懂得自由主義的辭令，很少知道自由主義的態度。從某一種觀點說，美國的進步主義極端需要革新，而這個革新也許要經過一個時期反對的間隔。它確實需要重整它的砲壘。

可是在原子彈出現以後的世界進度，已經不容許我們有從容優遊的時間了。因此，在今天，美國的左翼，已經心慌意亂，四分五裂了。新政擁護者正在從事於為民主黨注射興奮劑。而感傷主義者和夢想家則轉向了他們的哭牆（哭牆為耶路撒冷猶太聖蹟之一。此處殆指對現實之咒咒），無知地為共產黨的活動提供了一個掩護。

然而，希望還是有的。近兩年來，非共產主義的左翼觀念之出現，表現出美國政治，已經向成熟邁進了重要的一步。美國的左翼份子，遠不能暫動地辨認出共產黨人和他們的影響，如其他尚有政治自由的國家中的左翼份子一樣。可是，

工業組織大會中的反共產份子的鬥爭！美國民主行動會的結成，共產黨及馬歇爾計劃的運動，以後現在的第三黨，已經在自由份子的心理，掃除了試多迷惑了。這些發展，奠定了美國第三種力量的基礎，這個第三種力量，反對共產主義，也反對反動的大企業。

美國政治景色的輪廓，是如此地令人傷氣：一個分裂的左翼，一個弱小而又無定的中派，一個分裂而僅只部份復蘇的右翼。政府方面，除了道德的混亂之外，還存在着組織的混亂。幾年來，政府機構，特別是在對外事務的處理上，暴露出許多嚴重的缺點；這些缺點，在「兩黨」外交政策的口號之下，並未加以改正，只是隱藏了起來。

若問我們美國人民在政治上願望什麼。我們可以這樣答覆：我們願望和平，就業，以及華萊士在芝加哥所提出的一些其他普通的要求。然而我們的政治家們，像華萊士一樣，一觸及到如何取得我們的願望的問題的時候，就期口支上了。歷史並沒有指引我們希望從右翼方面得到許多良謀；雖然經濟發展委員會的工作，是在正規企業課題上的一個令人興奮的變化。希望也許還是在於擁護新政的左翼之復活。

這樣復活，必須立足於民主原則的嚴格意義之上，必須立足於對一切或左或右的民主敵人的堅決的反對之上。要避免自憐與感傷保持純潔和忠誠。首先，必須對一切的詳情，與以密切的謹慎的注意；要注意政府組織的詳情，財政政策的詳情，國家債務的詳情，租稅的詳情，反獨佔的

詳情以及其他，引人厭倦的事件的詳情。這些事件，雖然不如通過一件有關佛蘭哥或貝隆（Pepo 阿根廷獨裁者）的議案之有戲劇性，然而却無比地重要些。

左翼對這些問題，還沒有得出答案。但答案 是必需的；而且它們必須不以口號多者遍要求的 形式或提出來。美國民主行動會，在外交問題及 內政問題上，已經做了一些苦思力索之可讚美的 開端。可是還有許多事沒有作。自由份子，必須 少在傷感氣的怨天尤人方面浪費時間，把大部份 的時間，用以擬訂政策，而這些政策，必須基於 對生活事實的熱慮上。總之，現在已經是自由份 子開始從事於國內工作的時候了。如果他們再食 卒臨事的話，他們的失敗，對於我們的自由社會 或許真是致命的。

帶着某種心情，愛默生可以抱怨我們的政治 之卑下。可是他的寫作年代，是在傑克遜的時候 ，那個時候，我們是習慣於把它當作英雄時代來 回想的。在旁的心情底下，愛默生本人，也能夠 從政治鬥爭的背後，看出較為深刻的意義來。「 銀行和稅率，新聞紙和預選會，……在愚昧的人 民眼中，是平凡而且愚昧的，然而在這同一的基 礎之上，正建立着特羅伊城與台爾福斯神殿那樣 令人驚奇的建築哩。我們必須重新獲得對政治意 義的實感，因為如果我們不為它所弄好，我們也 無法弄好它的。總之，在民主政治裏，什麼樣的 人民，應得什麼樣的政府的話，是一點都不錯的 。我們不必認為，我們心裏懷藏的對人類的希望 ，正被壓碎。

（譯自三月十三日紐約民族週刊）

一月時事述評

本社資料室

國外之部

美蘇談判

去年十一月四日，馬歇爾的智命星杜爾斯說：「三強密交討論有關小國利益之問題，想今日已無任何人願意恢復此一制度。料維辛斯基今日亦決不願再採取強國秘密談判之方式。美國並不願放棄強國討論之原則，但亦決不願召開任何秘密會議。」今天看來杜爾斯的話，已經不折不扣地兌現，當他談話的時日，美國確是感到雅爾達、波茨坦及德黑蘭決議尚有礙於其擴張政策，因而表現為痛恨秘密的外交方式。但是經過她半年來的努力，那些信誓旦旦的諾言，已隨羅斯福精神成爲歷史陳跡，而大吹大擂的戰爭叫聲和略取基地，擴張軍備等言行，却震驚了世界人民尤其是愛好和平的美國人民，這種由擴張政策召致的必然反映，自不利於那類蒙蔽視聽始能推行的謀略，而更使盟在華萊士和平大講的行列愈來愈長，在此擴張佈告告一段落，大選日期漸漸迫近的時會，如何轉變世人的印象，把威脅世界和平的責任，巧妙地轉嫁給假想敵的身上，構成了新的課題，好在自己睡棄秘密外交，是半年前的一今日，在修辭上已經留下了做翻案文章的餘地。剛恰半年的时间過去了，在五月四日，美駐蘇大使奉其本國政府之

命，訪晤蘇外長莫洛托夫，自稱在歐洲的縱橫捭闔爲保護西歐各國政治完整，並基於假定蘇聯承認不再作那并未作過的事，更進而求其承認美國干涉別國內政爲合法行爲。并着重地向蘇聯說：「就美國而言，要廣泛討論并解決我們之間的爭論，門戶始終還是開着的。」

命，訪晤蘇外長莫洛托夫，自稱在歐洲的縱橫捭闔爲保護西歐各國政治完整，並基於假定蘇聯承認不再作那并未作過的事，更進而求其承認美國干涉別國內政爲合法行爲。并着重地向蘇聯說：「就美國而言，要廣泛討論并解決我們之間的爭論，門戶始終還是開着的。」

既然門戶還是開着，所以莫洛托夫馬上對於兩國直接談判改善兩國關係這一點加以接受。不過誤解杜爾斯的吩咐，把今年五月的一今日一當作了去年十一月的一今日一，依然一決不願再探強國秘密談判之方式，把史莫交換的條件公佈到世人面前。豈料當日痛恨秘密外交者，今日却痛愛起來，於是史密斯說「殊堪驚異」，馬歇爾說「至爲憤恨」，更與杜魯門及高級官吏一再發表聲明，一面說史密斯之向蘇聯提出談判門戶洞開是政府援命，一面又說美國政府拒絕與蘇聯談判：一面說要蘇聯提出具體建議作談判根據，一面又拒絕史太林的具體建議，一面說根本反對直接談判；一面又說史大林和莫洛托夫到華盛頓，但同時又把那經過自己親手破壞了的聯合國機構檢起來作泰山石敢當。所以有人說美國外交政策變幻莫測。其實關鍵只在蘇聯對於他的建議沒有秘密拒絕，反而公開接受了。要是蘇聯秘密拒絕，只要來一次義正詞嚴地向世人公佈他拒絕談判的罪過，那末，威脅世界和平的責任就可以輕輕出讓了。

西歐聯盟

適應援歐計劃的需要，醞釀已久的西歐聯盟，已步入實踐階段，經過一連串的會議，除了外交和經濟方面外，所謂防務問題被作爲主要的日程。於是訂定了五國防務計劃，將使武器標準化，并把訓練制度統一。還擬定各國可供行動的兵力，設立空軍基地網，組織最後指揮所。更決定常設五國軍事委員會，調查五國軍備，好作擴松歐圖之用。與此相應，美國也擴積極充實這一前進哨，打算修改援歐計劃，正式加強其軍事意義，只待方式決定就攤牌。

總選後的義大利，在後台支持下，仍將第二大黨的人民陣線攝諸政府之外，暫獲延續執政的喀斯貝里已在加入西歐聯盟，但美國通訊社所呼喚的共黨軍事叛亂却終不出現，不過，義大利人民是被喀斯貝里背棄得更遠了。

配合着英國外交部的計劃，瑞典外長那德又叫響起北歐聯盟，好與西歐聯盟結成難兄難弟，「鐵幕」的製造，邱吉爾之跋扈擲地，要亦不過親作北歐聯盟的酵素而已。此老迴光返照，顯得比「社會主義者」貝文更年輕，當五月七日歐洲聯合會議開幕，還親臨主持，又彈了一陣子早爲世人聽膩了的反共老調，聽衆來了二十三國，數量亦尚可觀。可惜的是儘管目的在爲買激馬歇爾計劃之實施，但美國終以邱老領導之保守黨，代表英國獨紹資本家的利益，對於他的忠忱仍不免

懷疑，因此，也予工黨政權以倖存的機會。

雖然，工黨也未老先衰了，內部的意見分歧一天天擴大，五月十七日舉行年會，雖有莫理遜之可獲人望的溫和意見，究難挽回追隨保守黨的既成趨勢，爲了美援，恨不得連社會主義的招牌也收起來；和對敵的保守黨相勾結，公然與邱吉爾唱和「歐洲聯盟運動」的黨員，可以自行其素，而對於致電義大利社會黨領袖南尼密爾頓，雖爲工黨議員竟被擄諸黨外。最顯得狼狽的，則是當美國一度說對蘇聯談判之門洞開時，貝文竟失却紳士風度，驚呼起來，完全暴露那遭受遺棄的急情，比那悶在心裏乾着急的同情者還不如，勉強說來，可謂與希臘現政府相伯仲。

不過，在另一方面英國倒比希臘要漂亮一點，當英國代替軸心國家，攻擊希臘反法西斯人人民武裝時，曾經俘虜若干愛國志士，僅囚之獄中。但雅典政權，近以軍事方面不斷失利，在其司法部長殞命之後，爲了勉強維持僅存區域的統治，竟不惜將那被囚的愛國志士集體槍決，想殺雞嚇猴，遺至全世界人士的抗議，英國當局雖不反對，也對於這種動人心弦的作風，感到失策。

南北韓會議

朝鮮人民需要團結和統一，還在南北韓政黨聯席會議是充分的表現出；該會於四月廿三日在平壤舉行，參加政黨有四十六個，出席五百餘人，這些單位的組成分子在一千萬人以上；南韓有韓國獨立黨，社會民主黨，民族婦女同盟，建國青年會

議是充分的表現出；該會於四月廿三日在平壤舉行，參加政黨有四十六個，出席五百餘人，這些單位的組成分子在一千萬人以上；南韓有韓國獨立黨，社會民主黨，民族婦女同盟，建國青年會

南北朝鮮統一的中央政府，並致函美蘇兩國政府，要求撤退駐軍，同時對於南韓的單獨選舉，一致反對，認爲係非法選舉。

蘇聯對於撤退的答覆是重覆其向美國兩度提出的意見，祇要美軍撤退，蘇軍便立時撤退。但是美軍的答覆硬留著不走；並且不願朝鮮人民的反對，於五月十日悍然舉行南韓的單獨選舉；據報載八百萬選民，有一半是婦女，還是用六萬警察和一百萬民團押去投票，所以大公報說「南韓選舉毫無自由空氣，開世界之惡例」。

在朝鮮到處受到反對，美國當局對韓民已是深感不滿；在日本就有鼓勵其封閉韓僑學校的事發生，神戶韓僑請願恢復學校，竟遭美軍逮捕，因之引起各地韓僑的反抗，美軍除加上罪名之外，並指揮日本警察出動鎮壓。

日本在美國的保護下，元氣日益恢復，繼輕工業，重工業相斷恢復之後，又有再武裝的進行，海上保安廳和警政大學的成立，等於是恢復海軍和陸軍省，艦艇可擴至一百多艘，十多萬警員必要時就可成爲軍官。五月十七日蘆田內閣發表五年經濟計劃，其目的即在恢復戰前工業水準。這樣一來，這隻老虎既被扶得站起，又給它裝上爪牙，遠東的災禍又得來臨。

巴勒斯坦的糾紛

巴勒斯坦已經是炮火喧天，此種復仇的戰事，竟至蔓延全境，自英軍放棄阿法城後，猶太軍頗佔優勢，隨後埃及、外約坦、黎巴嫩、敘利亞

出動大軍，配合當地阿拉伯會議所領導的阿拉伯軍大舉進攻，猶太人轉入劣勢。

在戰火瀰漫中，猶太人夢想了兩千年的復國運動，終於五月十四日，英國委任統治的結束日，誕生以色列國，新政府成立於台拉維夫，在聖城的猶太軍即正式與阿軍宣戰，動員令亦隨之頒布。新政府成立同日，美國異常迅速的予以承認，隨後危地馬拉，蘇聯，波蘭，烏拉圭，南斯拉夫

僧帽牌

蘇紗汗衫
衛生絨衫

· 行風處到 · 萃拔類出 ·

品出廠織棉和公 海上

號四十七路漢江：所行發分口漢

等國均先後予以承認，美國的迅速承認，是爲了規避對於巴勒斯坦局勢所應負的責任，並不能認爲是放棄了與阿拉伯反動派的合作。據傳英國曾與阿盟有協議，允許外約但等國合併巴勒斯坦；美國與英國的政策是不會背道而馳的；由最近英美間的密切接觸，就可得到證明，因爲英美所要求的是石油，既不是猶太的獨立，也不是阿拉伯的強盛，而是要它兩敗俱傷，甘於奴役，馴伏聽命。

繼荷印，印回之爭之後，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對於巴力斯坦，也同樣頒佈停戰令，以色列國已遵行頒令停戰，阿盟則仍拒絕調解；從荷印，印回之爭的例子看來，巴勒斯坦的苦難是不會馬上得到解決，真正和平還需要兩族的人民覺醒，共同爭取。

國內之部

烽火一月

戰局的演變，每每令人難以捉摸，可是經過較長時間的考驗，就可看出它的真象；這一月來，戰火逐漸全面展開，原先比較平靜的西北，首先爆發大戰，自從宜川失守之後，延安大受威脅，終於被迫撤離，至是陝北各縣全部淪陷，並繼續南移侵入涇渭河谷，長武，邠縣，永壽，乾縣，扶風，武功，寶雞等地相繼被侵，寶雞之失損失頗重，影響甚大，幸能隨即收復，才算稍紓其勢。與此役相呼應者爲陝省東南部之白水，洵陽棄守，鄂北均縣轉進，幾度增援，縣城均已克復。

，四鄉則日益紊亂。

宛西鄂北方面，自方城棄守，內鄉，鎮平，鄧縣，光化，老河口先後轉進，南陽，襄樊陷入重圍，五月二十一日老河口收復，繼續北追，最近於鄭州外圍又發生大戰。與鄂北相呼應者，有大洪山與江漢間之蠢動，沙洋，十里鋪，當陽各站棄守，沙市危急，宜昌震動，江漢間時有騷動，沙市東郊之資福寺亦傳被侵。

在山東方面，濰縣與昌樂之戰均告結束，據山東請願團人士謂「濰縣爲魯中財富集中之區，存煤五十萬噸，鐵二萬噸，機車三十多輛，客車四百餘輛，汽車百餘輛」，正爲其攻取之對象。昌、濰轉進之後，戰事已移向西南，安邱，莒縣等地均調動頻煩，表面似呈沉寂，大戰正在醞釀中。

東北方面，大戰似將爆發，熱西吃緊，已有自該方面入關者，承平路多被破壞，承古，平古兩線均受威脅，承德東北五十里之象鼻山已自動撤出，平泉，隆化，老河口，豐寧，王家子莊，頭溝等地均有激戰，新聞報載「共軍主力正在朝陽，義縣沿大凌河南下，可能先截斷榆錦段交通，以孤立錦州，再大舉侵犯」。華美晚報載「由北嶺黑山東竄共匪，已與遼陽林匪主力合流，此一企圖，軍方認爲顯欲威脅瀋陽」。種種跡象顯示空前大戰即將來臨。

此外察北多倫撤守，晉南臨汾攻防戰經月，終被侵佔；晉北應縣之圍迄未解除；江南四明山曾有騷動，杭州灣外小島有登陸之舉，雲南局勢也日益不安，全國每一角落，均已燃遍烽火。

華華公司

綢緞 呢絨 布疋 百貨

發行禮券 贈送最宜 花樣最多 售價最賤

地址 漢口江漢路後花樓口

自由論壇稿約簡則

- 一、本刊為社會性刊物，言則作者自負。
- 二、本刊之宗旨在於研討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之理論與實際問題，謀健全輿論之發展，藉以促進地方自治及民主制度之建立。凡適合此旨趣之文稿均所歡迎。
- 三、本刊歡迎下列三類文稿：
 1. 研討政治經濟財政文化教育社會等理論與實際的論文。
 2. 敘述各地政治經濟財政文化教育社會等實況的通訊。
 3. 短篇文藝作品。
- 四、論文每篇以四千字為原則，通訊與文藝作品每篇以二千字為原則。
- 五、稿文來體以語體文為原則，淺近文言亦間採用。
- 六、文稿須用有格稿紙，抄寫清楚，標點亦佔一格。
- 七、本刊對來稿有刪改權，如不願刪改請事先聲明。
- 八、各類來稿均須作者署真實姓名及詳細地址，否則不便登載。
- 九、來稿登載後其版權仍為作者所有，但如本刊棄印叢刊時，得自負編纂。
- 十、來稿一經登載，每千字的致稿費二十萬至三十萬元。

自由論壇

第三卷 第六期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六月一日出版

發行人 劉叔模

主編者 自由論壇社編輯委員會

發行所及定購處 漢口湘芬書局

分銷處 武漢及各地大書店

印刷所 中外印刷館

地址：漢口交通路廿六號

地址：漢口府東一路二〇六號

文鶴牌



堅牢 大方 風行 到處

華豐橡膠廠出品

總發行所：上海金馬路三十號

內政部登記證京警鄂字第一八四號
中華郵政認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本刊爲武漢雜誌社聯合會員
湖北郵政管理局執照第八三號

本期定價國幣五萬元

漢口發行所兩路文村五十號